

导 论

精神分析是西方各国中最有影响的社会哲学学说之一。在苏联的图书中，有不少著作令人信服地表明：齐·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自命不凡地以为他们所捍卫的是唯一正确的关于人的学说，这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在许多著作中也追溯了与精神分析有关联的哲学观点的发展。但是精神分析进化的许多方面，我国图书中暂时还没有阐明。然而在最近几年中，不论是精神分析学说本身，还是许多企图把精神分析同西方现代哲学其他流派结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家的观点，都发生了颇大的变化。

存在精神分析就是这种“综合”的最著名的形式。早在 30 年代就能观察到把精神分析与存在主义结合起来的企图，但一般地说它们没有得到这些学说信徒的响应。在 60 年代则形成了（如果可以这样

说的话)几千名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和心理疗法医生提出来的从存在主义者立场重新认识精神分析的运动。

虽然远不是所有一切这种重新认识的拥护者都采用“存在精神分析”这一名称,但就许多考虑来说,它最适合于概括这里所考察的所有学说。第一,不管某些强调自己的立场与让·保·萨特的“存在精神分析”不同的德国著作家的异议,就是在西方也常常为这些目的而使用它。差别是有的,但须知它们并没有妨碍使用萨特的术语“存在主义”,来说明德国、法国(马赛尔)、西班牙学说的特征;虽然这些学说的创始人不接受这一术语。第二,“存在精神分析”这一术语使我们能够突出心理学家和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的理论体系,同存在主义者哲学家的学说的区别。前者一般地说是实践的精神分析家,而且即使他们也不承认弗洛伊德的学说的话,那他们从弗洛伊德那里也继承了精神分析技术的基本特征。反之,职业哲学家不是对精神分析的这些方面根本不感兴趣,就是提出一些与精神分析的实践完全不相关的思想(如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

当卡·雅斯贝尔斯以分析尼采这位思想家创作中的病理因素预告自己关于尼采哲学的研究时,或者当萨特在夏·波德莱尔的童年感受中,寻找那决

定了这位诗人的整个往后生活和世界观的东西时，他们成了应当有助于理解一定的哲学思想或者诗人创作的传记研究著作作家。当然，存在精神分析家也从事这一类的研究。弗洛伊德本人以关于列昂纳多·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的研究论文开创了这种研究。但是他们的基本著作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是职业性地叙述病史，不容有关于某位艺术家或诗人的“奥狄浦斯情结”的幻想，似乎这种“情结”决定了艺术家或诗人的整个创作和他的作品的内容。其中是重病患者的实际生活事实、苦难、萦绕脑际的念头、荒诞的体系的枯燥而事务性的叙述。他们的真正姓名不知道——职业道德禁止精神病学家泄露它们，——而谈某个“爱伦·韦斯特”或者“黎古里·苏赫纳”；而所以描述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因为某种神经机能症或精神病的典型特征在他们的意识和行为中固定化了。哲学思考是因为和由于精神病学家在与心理失常的日常斗争中所打开的人的那些生活方面产生的。可以说，存在精神分析家企图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利用了存在哲学的基本概念。

西方哲学人类学中的新的流派的出现，就成了这种应用的结果，这不论对于哲学家或是对于精神病学家来说，都有点出乎意外。这种新鲜事物当然是相对的。须知存在主义的基本论旨仍旧保存着，

只是在其中加入了必要的修改，以便使形而上学的体系适应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资料。同时应当说，如果现在不能期待作为哲学理论的存在主义作新的发挥的话，那末正是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与神学一起，在西方是那些这种哲学相当根深蒂固并在那里继续发生其影响的领域。存在精神分析的创立者是企图坚持关于人的唯心主义学说的大精神病学家和心理疗法医生，他们依据存在哲学，首先是本世纪西方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的学说。他们写了不少著作，值得心理学家和医生们的注意。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只是他们的哲学见解。他们著作的心理学和医学方面将只是在与哲学问题有关系的限度内，才引起注意。

所以采用这种角度不仅仅是因为作者并不感到自己充分内行，足以就专门的科学问题进行写作。众所周知，甚至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家的理论受欢迎，看来并不是与解决这类问题有关，也不是与这方面对同行专家——心理学家和医生有影响有关。相反地，从心理学家和医生方面常常听到尖锐的反对意见，指责“存在分析家”不经过科学团体的代表们的同意，就转向广大读者，把极有争议的假设，宣传为绝对真理。对于他们的哲学论文尤其可以这样说：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在其中成了支持存在主义基

本论点的实例的总和。

因为存在精神分析的拥护者写的书籍和论文实际上汗牛充栋，我们只详细论述最知名的欧美理论家的著作。但在介绍他们的学说之前，必须至少大体上说明一下精神分析的现状，考察一下其著作对存在精神分析的形成发生过最重大影响的那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

— 第 1 章 —

精神分析的危机

1. 精神分析与资本主义社会

精神分析在本世纪初作为医学心理学的流派之一产生之后，起初由于齐·弗洛伊德的努力，然后也由于数量越来越多的他的追随者的努力，逐渐变成了一种自命为独创性地解决好象所有一切世界观问题的学说。同时它成了西欧，尤其是美国千百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使在狭义上采用精神分析——即作为医学心理学和心理疗法的一种形式，也形成了完整的协会、诊疗所、研究中心和教学中心网。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与精神分析有关的社会设施。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专家充塞了各种社会服务部门、福利基金会、干事会，他们在管理、广告、教育、职业指导所、立法等领域工作，在群

众性的信息等设施中工作。

但精神分析的影响并不限于此。它成了“美国生活方式”的组成要素（稍小些的程度内也是西欧生活方式的要素），对人类学和社会学、文艺学、美学、宗教学、历史研究，对所有各种类型的文学和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精神分析在西方造成了独特的“舆论气氛”，因为相当大数量的学者、经理、司法人员、僧侣、新闻记者、教员、作家及一系列职业的代表，在实践中都是指靠精神分析的。象“情结”，“挫折”，“压抑”，“文饰”，“升华”这样一些名词术语，都进入了日常生活用语。性行为、夫妇间的相互关系、孩子的教育，都借助于精神分析的公式来认识。

一种学说的基本论旨不是被说成是有争议的，就是被大部分科学团体简单地否定的，这种学说这样受欢迎是同什么有关系呢？实际运用精神分析的心理疗法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即一批医学科学代表的活动，是精神分析观的基础。精神分析的影响一部分是同此有关系：即他们在一定场合做到治愈或者至少暂时减轻了病人的病状。要不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决不会成为如此流行的心理疗法的形式。苏联心理疗法医生和精神病学家屡次指出精神分析实践中有个别积极的因素，同时着重指出弗洛伊德学

说一般理论论旨的缺点。如果不管投时髦之机的招摇撞骗者的话，精神分析家都是着‘治疗复杂的心理失常和尽自己的力量试图减轻病人痛苦的医生。

指靠精神分析的心理疗法按其效果来说显然不比一系列其他形式的心理疗法好（而在治疗某些心理失常时还坏些），这是另一回事。虽然如此，普通美国人，如舆论调查所表明的，一般地把心理疗法同精神分析混为一谈。如果估计到在报纸上、杂志上、电影里和小说里他经常碰到分析家这一治疗人的灵魂的人和行家的神秘形象的话，这是不奇怪的。著名的英国作家和学者查·伯·斯诺早在 50 年代末就已指出，在比较苏联和美国的文艺作品时，精神分析家在美国小说中的形象，就象工程师在苏联小说中的形象一样寻常^①。精神分析成了许多神话的源泉，甚至产生了一种到精神分析家那里求治的时髦：获得成功的商人、电影明星，甚至犯罪世界的头头（例如爱·薛列托在长篇小说《生活的起点》中描写了这种“病人”的肖像），都来暴露自己的情结。

精神分析的广泛影响和时兴不仅与心理分析治疗的效果有关，而且与其说是与精神分析治疗的效

参 见 查·伯·斯诺《两种文化》莫斯科 1973 年俄文版第 46 页。

果有关，不如说是与一整套社会因素有关。首先是在西欧各国患有神经机能症和精神病的人数目不断增长。在“自由世界”的主要国家里达半数的病床被患心理疾病的人所占。如 1978 至 1984 年国民心理健康研究所所作的广泛调查表明的，美国大约有 18.7% 的成人，至少患有一种精神失常病。最常见的是人们感到没有原因的焦虑（大约占被调查者的 8.3%），由于酗酒和滥用麻醉剂造成的精神失常占第二位（6.4%）。将近 1% 的美国人患有精神分裂症^①。在这样的情况下，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心理疾病不可避免地增长，以及提出自己的学说作为克服现状的手段的精神分析家，总能找到用心的听众、病人和追随者。

但促成精神分析传布的社会因素远不只限于此。精神分析不只是一种心理治疗和门诊所的业务。它同时是关于人的哲学学说，社会哲学，因此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成了西方文化的不可分的一部分。如美国社会学家彼·别尔格成功地套用华尔特·的话：“如果没有弗洛

参见 1984 年 10 月 19—25 日《在国外》杂志俄文版第 21 页。

② 可能指德国社会学家安德略斯·华尔特 Andreas Walther (1879—1960)，著有《美国的社会学和社会科学》(1927)一书——译者注

伊德的话，那也须要把他虚构出来'^①。根据别尔格的意见，精神分析传播的主要社会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中公共生活和私生活的范围差不多完全分开。这导致了“认同的危机”：在公民生活、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真正的我”。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劳动分工和资本主义生产、消费合理化的情况下，只能在私生活中去寻找自己的“真正的我”。这些人好象是说：请不要在我站在车床旁或柜台旁时来判断我，但是请到我家里来看我，那时你就会看到。认为家庭关系，尤其是性的关系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精神分析，原来是使这些思潮“合法化”的方便手段，它自以为给予大批惊惶不安的需要者以本来意义的意识。

精神分析对于公众的范围来说也同样重要。资本主义的生产合理化导致官僚主义化（别尔格跟在德国社会学家马·韦伯之后重复这一点）因此在官僚制度等级上的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中，心理因素、精神分析也提出的社会心理的控制手段，具有重大意义。最后，别尔格还指出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被吸引到他不了解其起

彼·别尔格《对于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理解》，见《面对现代性》纽约 1977 年英文版第 51 页。

作用的力量的局面中……社会象是神秘的力量那样屹立在个人面前，或者换句话说，个人对于造成他的生活的那些基本力量，是无意识的’^①。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社会经验，与弗洛伊德把人的精神生活解释为受潜意识过程支配相一致。

别尔格作为西方著名的宗教社会学家之一，认为精神分析具有宗教崇拜的职能。不管精神分析包含着不少庸俗唯物主义精神的论点，这种唯物主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是“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②。类似于宗教观念一样，精神分析提出关于现实的神秘化的观念，把所有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神话式的、神秘力量的作用。可是也象宗教崇拜一样，精神分析所执行的完全是尘世的职能。个人的“适应”使他适应于周围世界，是精神分析的最重要任务。精神分析把这个医学、心理学的范畴绝对化了：只有很好地适应于现存社会的人，才被认为是健康的。当精神分析家认为自己的目的在于恢复病人的心理健康时，他就有根据谈病人适应于现实。可是在给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下定义时，他就抛

彼·别尔格《对于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的理解》，见《面对现代性》英文版第 59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第 202 页。

弃了医学的科学基础。

精神分析中把精神失常同存在没有根绝的童年的欲望联系起来。神经机能症病人的所有一切困难，也包括社会制度的，都用潜意识的冲动来解释，这种潜意识的冲动是由于同社会现存的规范和价值不相容而压抑下去的。尤其是精神分析认为人具有某种“侵略性的本能”，因此暴力、战争、压迫，都被宣称为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因为据说它们存在于人的本性本身中。精神分析中具有把整个范围的社会问题全都归结为家庭关系的固定倾向。社会规律性被心理学化了，都透过父母与子女之间联系的棱镜来看。比如，任何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从精神分析者的观点看来，都是按类似于宗法家庭中父子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政治领袖由于有威严的父亲的形象的某些特征转移到他身上而获得威信等等。这样一来，精神分析家就造成了关于他的病人应当去适应的那种现实的歪曲观念。

除此之外，精神分析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使个人不是适应一般社会，而是适应具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对于阶级社会不同集团的代表们来说，“最适宜的发展”、“适应性”是什么意思，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美国南部和南非共和国不同肤色

的人的“最适宜的发展”对于精神分析家来说，同样在于适应现存的秩序。精神分析变成了以重复现状为使命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设施之一。企业的“人的关系”的专家，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国家机关、商业、群众性信息手段中的顾问，忠诚地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服务。

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谈到这一点，而且许多认识到精神分析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组成部分的精神分析家也谈到这一点。而且就是对于那些宣称自己的意图是把精神分析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人来说，其特征是具有关于社会的完全错误的观念。他们把社会经济问题都归结为个人的或者集体的心理学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被宣称为“病人”，资本主义成了“集体的神经机能症”。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造成一种情况个人的心理经受不住这种情况（群众性的失业、对将来没有信心、竞争、犯罪等等），可是资本主义不是神经机能症。只有个人才能是这个词的医学意义上的病人，而关于“有病的”社会和“健康的”社会的议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引导到空想的计划——即类似于爱·弗罗姆所宣传的在精神分析诊室中“医治”资本主义的思想。我们强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因为弗罗姆诚恳地批判过资本主义社会。通常关于

“有病的”社会的议论，具有露骨的辩护性质。正如法国哲学家让·波特里耶尔中肯地指出的：“甚至工业家也装作宣传普遍幸福和繁荣的传教士。‘社会有病，——这就是所有那些掌权的好心人的主导思想……这是关于有病的社会的大神话，消除了对实际的矛盾作任何分析的神话，现代知识分子巫师参与的神话’^①。精神分析家知识分子与商人之间的差别，仅仅归结为：前者在人和社会的本性本身中寻找“毛病”后者则雇佣顾问并借助于应用心理技术来“治疗”自己的工人和职员，而这是带来利润的。

分析精神分析的诸如此类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职能，不是我们的课题。可是这些职能对于保持和传佈精神分析的影响，有直接关系。当谈到精神分析的危机或甚至“破产”（哈·威尔斯语）时，指的不是好几千开业的精神分析家队伍的消失，而是作为关于人的完整学说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危机。可是社会哲学和心理学学说的危机状态不能不影响到精神分析的所有一切应用方面——它的大厦失去了基础，而建筑在沙土上的东西，大家知道是不能长久屹立的。因此，精神分析理论的危机看来是多方面

让·波特里耶尔《消费社会》巴黎 1970 年法文版第 266 页。

的，它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和职业集团的利益，——既涉及实际运用它的那些人，也涉及宣传它和利用它的那些人。

2. 齐·弗洛伊德的哲学人类学的某些特征

弗洛伊德在世就已开始的改造精神分析学说的复杂过程(弗洛伊德本人屡次翻改自己的学说)由于一系列原因带有慢性危机的性质。早在 20 年代，苏联心理学家列·谢·维戈特斯基就预言过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变成哲学世界观的心理学理论，其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哲学世界观希望借助于极其有限的几种原则和公设来解释所有一切。维戈特斯基把变成形而上学的心理学，比作“膨胀成阉牛的青蛙”比作“贵族中的小市民”，哲学和学者不可避免地会向他指出他的微末的出身^①。人们虽然就精神分析中提出的部分科学论点、方法和程序进行激烈的争论，可是弗洛伊德的“心理玄学”就是说他的学说的哲学和一般方法论原则的总和，却成了批判的对象。

不管精神分析信徒的数目及它对资本主义世界

参见《列·谢·维戈特斯基文集》莫斯科 1982 年俄文版第 1 卷第 297—308 页。

广大居民阶层的影响继续增长，没有一个弗洛伊德学说的理论公设不被不仅是它的反对者而且是精神分析家本身提出异议。矛盾仍然没有解决，离心倾向却增长着。出现了与正式的精神分析协会斗争的一切新的“异端”学派。这一过程也扩及到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精神分析最初的“异端者”阿·阿德勒和卡·古·荣格的观点以及新弗洛伊德派的观点不受欢迎，精神分析变成了它的正统弗洛伊德学说的变种。比如，在法国，过去曾经统一的全国性的协会，分裂成四个精神分析团体，每一个团体出版自己的杂志，按自己的方法培养专家。这里还没有列入许多不大的、但很活跃的、能够在顺利的情况下也变成协会的宗派小组。

当然，在学派和宗派之间的这种斗争中，很多事情是决定于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寻常的竞争。可是论战的根源在于弗洛伊德学说中有许多东西必须重新审查，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想都被吸引来重新认识弗洛伊德学说的原理。现在不仅“分裂者”而且精神分析协会的完全正统的成员都注意这种思想。精神分析正在改造——弗洛伊德的哲学人类学被从自己家里赶出来，其他哲学学说的论点占据了它的地位。

弗洛伊德创立了一种学说，这种学说被利用来

不仅仅是为了说明神经机能病人的行为和思想，而且也了解释似乎是所有一切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经验材料。弗洛伊德与当时学院派的心理学不同，着重强调人的心理中存在着冲突，开始在历史中和在某些社会因素作用的联系中来考察个人的精神生活。他的不容置疑的功绩是：研究了关于人们行动的无意识动机和有意识的动机可变动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心理现象中存在不同层次问题。弗洛伊德也能指出他当时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些消极方面，因为他所描述的那些内心心理冲突，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人们生存条件的反映。弗·马·莱宾写道：“无疑地，他能在生动的速写中暴露出资本主义文明的条件下个人意识的冲突情境、戏剧性和分裂性。可是弗洛伊德在其理论结论中没有理由地把这种分裂性绝对化。他把问题强调到如此程度，以致个人的意识与潜意识欲望之间的矛盾，在他那里变成了一种悲剧，即在每个人的灵魂里永远在发展着的、并且预先决定了个人以及整个全人类命运的悲剧”^①。

弗·马·莱宾《精神分析与新弗洛伊德学说的哲学》莫斯科1977年俄文版第59页。在这本书中，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一系列著作中，对弗洛伊德学说作了使人信服的批评，对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论点作了阐述。参见费·巴辛、弗·罗日诺夫、马·罗日诺娃的《弗洛伊德学说：